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学·术·系·列

韩 昇主编

古代中国： 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学·术·系·列

韩 昇主编

古代中国： 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韩昇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学术系列)

ISBN 978-7-208-07657-0

I. 古… II. 韩… III. 中国-古代史-文集

IV. K2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8037 号

责任编辑 曹勇庆

封面装帧 杨德鸿

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

韩 昇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30 插页 3 字数 528,000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657-0/K · 1416

定价 56.00 元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学术书系》

主 办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编 委 会

主 任 王生洪 金在烈

委 员 华 民 吴景平(执行) 郑祖康

姜义华 顾云深 倪世雄 董茂云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学术书系

编 纂 说 明

一、本书系为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策划和资助出版的学术系列,不定期委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本书系收入范围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各地区,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三、本书系主要为专门性学术著作、专题论集。

四、本书系书稿的人选由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确定,但不
对作者的学术观点作评判。

前 言

韩 昇

2005年是复旦大学创立一百年、历史学系成立八十周年的双重庆典年，而我们也刚刚跨过二十世纪。在这个世纪性的庆典年里，来自世界各国著名大学的一百多位校长云集复旦大学，共同探讨如何办好二十一世纪的大学；历史学系也在校园内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的中国古代史学术研讨会，为盛大的校庆、系庆添彩助阵，同时也在回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八十年走过的路。本书便是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选编。

中国大学的路走得十分艰难，她出现在中国的教育理念乃至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

大家都公认孔子为中国古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家，当时，孔子所面临的也是社会转型的历史时刻。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局面，是西周封建制在国家权力直接控制社会的郡县制冲击下出现的。孔子希望通过教育为国家提供一大批优秀的人才。《论语·子张》记载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学而优则仕。”这句话常被当作孔子的教育理念。随着时代的推移，这句话的解释发生了变化，至少在中古时期已经变成学习出众者当官的意思，后来几乎成为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我们不去探讨其功过是非，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孔子教育思想里蕴含着精英治国的理念。孔子视为精英者，不只是学习优异，他更强调的是品行优异、胸怀儒家治国理想的士人。儒学成为国家教育之本后，古代的教育几乎成为单一的培养官吏的学校。

到近代，受西方“船坚炮利”的巨大冲击，中国开始尝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兴办大学，学习西方的技术。所以，大学的出现同样是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新型大学不同于旧的教育体制，从学习西方技术出发，不知不觉中逐步造成学术独立，以实验科学作为学术的标准，从而同旧教育划清第一道界线。复旦大学建立于1905年，属于中国早期建立的大学，是在新的教育理念下诞生的大学。

复旦大学历史系也是因为国家和民族存亡的需要而创设的,这从其研究的方向可以略见一斑。晚清以来,国家内忧外患,风雨交加。长期以来,中国安于中央大国的梦乡之中,对外国的情况不了解,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了解。举个例子说,自宋朝以来,中国长期遭受“倭寇”之患,可是,日本究竟在何处,中国古代的地图几乎就没有正确标示过。至于西洋列强的东来,中国四面边疆无处不吃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地理学和民族史、中外关系史首先异军突起,并与西方的历史学相衔接,为中国的近代历史学奠定基础。在这条学术线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顾颉刚、谭其骧教授倡导并积极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方豪、章巽教授研究中外关系史;周予同教授变古经学为现代学术;陈守实教授致力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阐发;胡厚宣教授研究上古史和古文字;田汝康教授拓荒于社会学与人类学历史领域;周谷城教授撰写中国通史和政治史……以上仅对中国古代史方向回首一瞥,已经被这个群星璀璨的学术群体深深吸引住了。他们的杰出贡献,回应了中国从古代王朝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文化要求,为近代学科的建立开了先河。

当年,复旦大学在校歌里给自己提出三个办学的目标:“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巩固学校维护国家,先忧后乐交相勉;作育国士恢廓学风,震欧铄美声名满。”应该说复旦大学没有辜负社会的期望,从她简朴的校门走出去的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人物,陈寅恪提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口号,与他当年在复旦大学受到的熏陶颇有关系。在“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环境中,复旦大学的百年,培养出数不清的人才,以“先忧后乐”相勉励,在中国近代国难重重之中,复旦大学的学子一直走在时代的最前列,担负起国家、民族的重任,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永远心系祖国,于右任临终绝唱:“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见兮,永不能忘。”复旦大学的学者、学子无愧于那个时代。

中国从帝制国家向共和国的转型,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大学的建设也几经挫折;复旦大学曾经停办,也曾经被迫内迁。然而,复旦坚持了下来,不但没有衰落,反而越办越好。为什么呢?我想有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用海纳百川的胸怀吸纳一大批杰出学者,成为广大青年向往之地。一个社会剧烈变化的年代,必然有各种人物产生,各种思想喷涌而出,复旦大学能够将他们聚拢在一起,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广泛的交流中发出光芒,这是需要有胸怀的。历史系那么多令人尊敬的学者,来自五湖四海,皆一时之选,得人之盛,备受称道。有了这样一批学术精英,才能开辟出一片片学术前沿,建立一个个新的学科,引领学术潮流,促成社会转型。

从近代大学建立以后,经过相当长的发展,人们认识到把技术和文化割裂

开来,只要技术,不要文化,或者是“中体西用”,都是行不通的。所以,大学不仅是技术科学的象牙塔,而且,还是民族精神的培育地,如何融汇中西,贯通古今,形成新的文化精神,满足时代的要求,就成为大学要肩负的使命。大学自身也需要转型。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前辈学者,用他们辉煌的学术成就,完成了他们奠基之功,把一个颇有口碑的系交给我们。而我们现在也面临着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大潮,能不能继承这份基业,使之发扬光大,担负起我们这代人的使命,这个问题考验着我们的胸怀和眼光。

所以,在追思复旦大学百年历史的时候,历史系也在思考着自己的发展方向。

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本,而古代史又是历史学其他专业的基础,本着这样的认识,通过举办一次古代史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纪念复旦大学历史系成立八十年,便成为全系同仁的共同愿望。社会转型必然激发出各种思想,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又促进社会的发展,学术研究也一样,所以,我们选择了“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作为主题,诚邀国内外学者共同研讨。

大家知道,古代史虽然重要,但是,它不是万众瞩目的学科,也不应该是喧嚣热闹的公共话题。古代史研究者的工作是摒弃浮躁,沉下心来,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实事求是地考证历史事实,通过细致分析古代,让今人从中获得启发和感悟。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淡泊宁静地做一些实实在在的研究,不为吸引听众而发耸人之论,不求响亮,但求深沉。非常感谢海内外众多的学者,他们放下手边繁忙的工作,携带多年研究的力作,前来参加本次会议。这么多著名学者聚集一堂,发表了那么多珠玑篇章,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看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依然充满希望。

最感遗憾的是由于篇幅的关系,无法将所有的论文都收录发表,无论哪一篇都难以割舍,令我们颇费踌躇,拖延了许多时日。无论入选与否,我们的感谢都是相同的。

2005年以来,我们已经编选出版了《古代中国:传统与变革》和《古代中国:东亚世界的内在交流》,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第三本论文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在延续,不曾间断,我们不敢松懈,默默挥汗,一步一个脚印。

卿云烂兮,糺纚纚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目

录

前言	韩 昇	1
姓氏与图腾——兼评“商族鸟图腾说”	高智群	1
大国・小国の関係と漢字伝播	平勢隆郎	13
关于秦汉王朝爵位制的转变——浅析日中 爵位制研究的迥异	藤田高夫	24
汉国号的沿用及相关问题述论	胡阿祥	30
日本的中国古代国制史研究及其课题	杉村伸二	43
读《三国志・孙和传》、韦昭《博弈论》推论孙吴 中期士风的变化与侨、旧士风的差异	王永平	51
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	李伯重	64
北魏における滎陽鄭氏	窪添慶文	92
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侯旭东	114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 荣新江		138
隋文帝抗击突厥及其内政因素	韩 昇	153
日本舶来唐令的年代推断	坂上康俊	168
日本遣唐使并真成の入唐時期と改名・ 出自	鈴木靖民	176
禅宗的转型	鈴木哲雄	191
宗教异端与社会异端——以中国历史上 佛教中的转化为例	严耀中	211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私社的教育与教化 功能	郝春文	218
日本僧空海が持ち帰った唐画「真言五祖像」 西本昌弘		231
唐宋敦煌醮祭镇宅法考索	余 欣	236
论两宋时期江南的乡村集市	陈国灿	250

11—13 世纪中国海外贸易繁荣与东南亚地区	
市场的发展	黄纯艳 259
元、明之际的华亭“璜溪吕氏”	王 颀 273
明清地域商帮之间的经营纠纷	范金民 285
明代华北的煤矿开采——生态变迁与	
国家权力的双重变奏	邱仲麟 297
明代福建社会风气的变迁	徐 泓 312
晚明师道内涵的转向——周汝登略论	邓志峰 325
晚明家具的消费文化	巫仁恕 338
徽州村落文书的形成——以抄本《新安上溪源	
程氏乡局记》二种为中心	王振忠 357
试论十七世纪中国的法律批判与法律推理	
.....	邱澎生 375
清代上海与沙船航运业	松浦章 393
康熙年间来华朝鲜使团对清朝储位情报的收集——	
对宗藩体系下国家关系的实态考察	伍 跃 401
近代社会情境中的市镇研究	任 放 421
日本古代の修史事業と風土記	瀧音能之 433
古代日本的佛家与汉籍	河野贵美子 439
戦前の陰陽道研究と歴史学	水口幹記 454

姓氏与图腾

——兼评“商族鸟图腾说”

高智群

(复旦大学历史系)

姓氏学是近年来中国文化史领域内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课题,特别是先秦姓氏的来源,更是成为探讨的重点。目前多数学者都主张姓氏出自图腾,并提出许多证据,从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多种角度加以证明。我们今天也以此作为研究专题,着重评析“姓氏图腾说”的诸种观点,请海内外方家指正。我们的看法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证实中国古代的姓氏来源于图腾。商代存在鸟崇拜,但是“玄鸟”并不具备祖先图腾的意味。

一、“姓氏来自图腾名称”

自从20世纪初期国外人类学被介绍到中国之后,就开始有学者借用“图腾”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古代姓氏的来源,最早进行这种尝试的是严复^①。30年代后,这方面的论著更多,其中以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1949年)影响最大。李氏认为,“姓即图腾的结果,在文字内现在尚能看到他种遗痕”。他运用文字训诂学中的形训和声训方法,为古代姓氏一一找出其图腾形象,如“风为风姓图腾”,其他种姓与图腾对应的还有,姜—羊,扈—扈,姬—苙(白芷,植物名),姚—桃,姒—薏苡,彭—鼓,曹—枣,等等^②。此后不少著名学者如吕振羽、卫聚贤、孙作云、丁山、胡厚宣、于省吾等先生也都从不同侧面论证姓氏源自上古图腾,如吕振羽曾说:“在中国今日的姓氏中,也保留不少的原始图腾名

① 金克斯著,严复译《社会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重版,第8—9页。

② 《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开明书店1949年版,第34—35页;第83—87页;第106—114页。

称的遗迹,如马、牛、羊、猪、邬、凤、梅、李、桃、花、叶、林、河、山、水、云、沙、石、毛、皮、龙、冯、蛇、风……等等。^①”当今学术界不少人更将图腾崇拜的表现,从姓氏学扩大到考古等领域,将古遗址、古器物中出现的各种动植物形象看作是图腾遗迹,似乎从史前到三代,中国有过一个非常发达的图腾文化。集中阐述这种理论的便是何星亮的《中国图腾文化》。

汉代学者,已经提出姓取自其女性祖先致孕之物名称的观点,王充《论衡·诂术篇》说:

古者因生以赐姓,因其所生赐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则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则姓为子氏;周履大人迹,则姬氏。

“因生以赐姓”,见《左隐》八年。这是说,夏禹因其母吞薏苡而生,故夏姓苡(姁);商契之母简狄,吞鸟卵(燕子蛋)而生契,故商姓子;周祖弃,其母姜嫄,履大人之迹而孕,故周姓姬。班固《白虎通·姓名》和纬书《礼纬》(《史记·夏本纪》、《殷本纪》集解引)也有类似的讲法。看来这是汉代流行的关于姓氏起源的解释,只不过没有使用“图腾”这个名词而已。这种感生说有其古老的历史传承(如商周起源的传说,来自先秦。但夏后氏“薏苡”致孕,不见于早期文献,不尽可信^②),也反映了汉代“天人感应”思潮的影响。

二、“图腾”与姓氏的异同

中国古代姓氏是不是来源于图腾,它和动植物名称究竟有何关联?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考察文化人类学关于“图腾”的概念。一般认为,图腾崇拜具备如下特征:

1. 认为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植物或无生物之间有亲密的血缘联系。“图腾”(totem)一词源自北美印第安人鄂吉布瓦人的方言,意为“我(他)们的亲族”。这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成为其图腾,是该氏族的祖先和保护神,又被称为“祖父”、“父亲”。人与图腾可以相互转化。

2. “图腾”可随共同体分裂而分化成不同的图腾。在少数澳洲土著部落中,还曾保留着最完整发达的图腾崇拜形式——分级图腾(氏族—胞—婚级—两性一个人),每级都拥有各自的图腾。

^①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77 页。

^② 马雍先生已经指出,夏禹之母梦吞薏苡之说,是汉代学者望文生义,杜撰出来的。(《中国姓氏制度的沿革》,《中国文化》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7 页。

3. 图腾作为氏族的徽志,被刻画在柱子、器皿、武器、身体等之上。北美、非洲都有十分发达的图腾艺术。

4. 同一图腾的人有共同的图腾神话、禁忌规定和巫术仪式,严禁同一图腾的人们相互通婚。^①

“图腾”与中国古代姓氏在某些方面确实非常相像,如:(1)姓和图腾都是血缘共同体的标志(这种标志也有人称作“族号”。案:不是所有的图腾都等于族号)。(2)它们都会随共同体的分裂而分化出不同的名称。如黄帝之“姬”姓,后代就分化姬、己、姚、姒、祁、任、董、彭等将近20个分化姓。分化姓又可再分衍出新姓,如姚(舜,颛顼之后,属黄帝一系)就分出了“子”(商契)姓。夏代以后,姓分化停止,氏开始出现,成为姓的分支,后来也经历了类似“姓”的分化过程。而图腾也会随共同体扩大而发生裂变,如熊图腾可分裂成狗熊、猪熊、大熊三个女儿图腾。(3)同一图腾或同姓不得通婚。这是因为拥有相同姓或图腾的人都属于同一个血缘共同体(同族),按照氏族族外婚的原则而实行这种禁忌。(4)在上古有关氏族起源的神话中,女性祖先感生之物常常与动植物有关,这与图腾部落的人们相信他们和图腾物源出同一个祖先具有相似的观念。(5)图腾名称多取自动植物,而三代有些姓氏得名可能也和动植物有关。如太皞“风”姓,风与凤本一字,如甲骨文“帝使凤”,“宁风(风)”,二字相通。

我们认为,尽管图腾制与姓氏制在上述许多方面具备相近的特征,但它们存在本质的区别,换言之,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姓氏来源与图腾没有必然的关联。

首先,图腾与姓氏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根据国外人类学家如杜尔凯姆等人的意见,图腾崇拜是人类迄今可能发现的最原始、最简单的宗教形式。它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盛行于母系社会阶段,进入父系社会之后,它的影响力逐渐衰落,到了文明社会孕育和诞生之时,它已经被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所取代,充其量仅剩残余形态而已,并且往往与动物崇拜相混同。所谓“动物崇拜”,属于自然崇拜的一种形式,它的起因主要来自对危及人类生存的凶禽猛兽的畏惧和对作为食物来源的动物的敬仰膜拜,但不将它们视作人类的养育者和祖先。在这一点上,它和图腾崇拜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而中国古姓的起源时间,大大晚于图腾制流行的阶段。目前我

^① 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人类学界就开始了对于图腾制度眼花缭乱的讨论,200多年来至少出现几十种的图腾理论,我们这里介绍的是比较为中国学术界接受的观点。对图腾制度的评述,可阅[美]埃尔曼等《人类学百年争论》、俞伟操《古史的考古学探索》等书。

们所能追溯的姓的产生时代,大约都在黄帝炎帝到夏禹这个阶段,其数量约30余个^①。此时中原等广大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到早期文明国家,怎么还会沿用最原始的宗教信仰,为国族(或姓)采用图腾名号呢?至于“氏”的起源时间就更晚,它是在国家产生之后,贵族阶级根据宗法,分封等方面的需要而发展出来的新的共同体称号。当时贵族阶级由于政治上的分封或者是族中人口繁衍等原因,宗族组织内部产生了若干分支,它们从母族中分离出去,除了保留原有的姓外,又为新的家支起了不同的名称,这就是“氏”。它既作为宗族血缘共同体的标记,更被贵族阶级用来“别贵贱”,标明家世和地位。产生于文明初曙时代的姓,数量可考的大约仅有30余个。而进入国家后所出现的氏,数量就多得惊人。据统计,古今姓氏总数有6300多个,现代汉族所使用的姓,总数约在2000个左右。这些姓绝大多数是在战国秦汉之际由先秦的氏转变而来的,只有一小部分沿用先秦的古姓。像吕振羽等先生所举的牛、马、羊等姓,原先都是氏名,出现的时间多数不早于春秋,有的晚到秦汉,甚至是魏晋以后由异族内迁而带入中原的,马雍先生对此已有专文详细考辨^②。这种晚出的姓氏,他们的起源更是与图腾风马牛不相及,显然不能作为“姓氏出自图腾”的依据。

其次,中国上古的姓并不具备图腾祖先的意味。最古老的姓只有五个,即黄帝的姬姓,炎帝的姜姓,太皞的风姓,少皞的嬴姓,皋陶(约当舜禹)的偃姓。如依段玉裁考证,偃嬴乃一声之转,实际只有四姓(按,偃嬴声母相距较远,未必通转)。这五姓之中,姬姜二姓的得名与地名有关。《国语·晋语》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姜二姓,即来自于部落所居地名。我们知道,多数的古姓本不加女旁,其字从女,该是它成为姓氏之后所加,并且和母系社会没有关系。因此姬姜二姓,原来可能就作“臣”、“羌”。取自地名的古姓,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舜之姚姓,得自舜居姚墟。其后代陈国始封君胡公受武王赐姓“妫”,亦得名于“妫汭”(《史记·陈杞世家》)。我们还知道,上古地名多数都是假借字,它只是一个记音符号,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如“姬”姓,李玄伯读作“菑”,以为是菑草,孙作云则谓“臣”像熊迹之形,黄帝以熊为图腾,周人承之。汉人读为“迹”,即“大人之迹”。^③实际上,姬字从臣(甲骨文作) ,乃筐之本字,即梳子^④。显然,“姬”作为姓,只是表音符号,与本形本义无关。

至于氏的得名情况就更加清楚,它主要取自地名(如封国名、封邑名、所居

① 谢维扬《周代家族形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118页。

② 《中国姓氏制度的沿革》,《中国文化》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载《孙作云集·诗经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04页。

④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6—67页。

之地名)、官名、祖先之名(确切地说绝大多数是祖父之字,如宋恒公之子名公子目夷,字子鱼——(子)公孙友——(孙)鱼莒,鱼石,以“鱼”为氏),商周以来一直如此。由于古代有些地名或人名取自于动植物,因此氏名中也有这类名称,但这并没有图腾的意味。^①周代有一种命名方式叫“假”(见《左传》六年申繻评论),就是用事物的名称来起人名。因此春秋经传中名字取自动植物的例子举不胜举(见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等书),如孔子生儿子时,正好有人馈赠鲤鱼,故名之“孔鲤”,字伯鱼。还有郑国驷氏(公子驪,字子驪——(子)公孙夏——(孙)驪带、驪乞……)等,都是得名于此。如果他们的后代以其名字为氏,那么氏名就会出现动植物一类如鱼、驪的名称,我们决不能说它们是以鱼、马等物作为图腾祖先。到了战国以后姓与氏相混淆,于是鱼氏就成为鱼姓,余可类推。有些学者见到某些姓氏恰好是动植物名称,就发生图腾联想,像于省吾先生这样一位治学十分严谨的学者,在讨论商周族号时,也不免疏失。如商代族名金文中常见一个族号𪚩(大龟),因为于老持商代玄鸟图腾说,很自然地就认为这是一个以蛙龟为图腾的商世族。“在商代铜器铭文中,除玄鸟图腾外又发现了蛙龟图腾”。^②如果这种观点正确的话,子姓的商族就同时拥有鸟、蛙等多种图腾物,就是说,在商周这样高级文明的社会内部,竟然还维持着即使在原始部族阶段也不多见的分级图腾这种发达的图腾崇拜形式,这显然和我们所了解的上古宗教一般进程大相径庭。

这里还要附带讨论一下所谓黄帝族的分级图腾问题。《史记·五帝本纪》有这样记载:

(轩辕)教熊黑貔貅羆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现今多数人都认为,黄帝号“有熊氏”,以熊为图腾;熊、黑、貔、貅、羆、虎是黄帝部落中的六个氏族,各以图腾动物作为族名。其实这样的观点是大有问题的。黄帝族为姬姓,该部族得姓显然与熊无关。如果硬要扯上关系的话,只能把“熊”看作是黄帝的个人图腾。若将“姬”也视为图腾标记的话,黄帝族至少有

① 有的学者把名字取自动物的上古帝王如“高祖颡”(商人先公)看作是“半人半兽、半人半神……不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罗琨《殷卜辞中高祖王亥史迹寻绎》,《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这是不妥当的。夏禹的得名,也是取自一种爬行动物。据顾颉刚、童书业、杨宽等先生的考证,禹即句龙(《古史辨》第七册),从金文“禹”作的字形看,可能是蛇虺、蜥蜴、鳄鱼之类的爬行动物,而据闻一多的考证,这类动物正是龙的原型。据古文字“禽”、“萬”,“虫”(害)下半部分的演变规律看,“禹”最初的形体可能和“虫”(虺)相近,甲骨文虺(𪚩)从齿从虫,亦可作佐证。西周晚期《叔向簋》,叔向父名禹,孙诒让《名原》读“向”为“饗”,乃地中的知声虫,与“禹”意义相应。《说文》亦训“禹”为“蟲也”(“有足谓之蟲”),可知西周晚期以后,“禹”字已经渐昧本义。禹作为真实的带有神话色彩的历史人物,已经在西周中后期豳公盃等出土器物中得到证明。看来用人们熟悉的动植物名称作为个人私名的情况,在初民社会就已经出现(民族学中有大量这类资料,不赘举)。这是上古的一种习俗,和个人图腾无关,也不能视为“半人半兽”。

② 《释龟、鼈》,《古文字研究》第七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三个分级图腾(部族—氏族—一个人)。但是古史明确记载,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其中得姓十四人,共十二姓,即姬、酉、己、滕、箴、任、荀、僖、姁、偃、依(《国语·晋语四》),这十二姓后来还有十来个分化姓。从这些黄帝支裔的姓氏名称看,没有任何动物能与之对得上号^①。因此关于《史记》的这段记载,应该另作解释。在我们看来有三种可能,一是把驱兽助战看作与黄帝请天女魃(《山海经》)同类的神话传说。二是将它看作信史,如《史记·索隐》所说,“此六者猛兽,可以教战”。在民族学和文献记载中,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可以印证,如“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吕氏春秋·古乐》)。甲骨文的“象”字,正像“服象”之形。《周礼·夏官司马》有服不氏,“掌养猛兽而教扰(驯也)之”,孙诒让举上引《五帝本纪》文以证“古有教扰猛兽之术”^②。后来王莽还曾加以仿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武威”(《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三种可能,这六种猛兽,其实就是六支戴着野兽面具的军队,犹如鲁宋郎之战,公子偃“蒙皋比(虎皮)而先犯之”(《左传·庄公十年》)^③。甲骨文𠄎(蒙)字,像人蒙着虎皮假面,说明这种习俗起源的古老^④。显然后二种解释,要比图腾说更加合理。可以这样说,在现有的古文献和古文字资料中,是找不到中国早期社会存在发达的多极图腾这样的确切证据的。

在前面所举的古姓中,太皞的风姓最值得注意。在古文字资料中,风和凤为一字。卜辞“宁风”,“帝使凤(风)”,字都作,像凤鸟之类的形象;献中又有两皞部落以鸟名官,实行凤鸟崇拜的记载;少皞之后的秦人更有“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史记·秦本纪》)的感生神话。因此很多学者都相信东夷两皞部落以凤鸟作为图腾圣物。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文献中明确记载少皞氏以鸟名官的真正原因:

郑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公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郑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杜注: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

① 李玄伯、李泽厚等人认为“己”和“巳”均像蛇形,与蛇—龙图腾有关(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注),不可信,古文字中另有表示“蛇”意的“虫”“它”诸字。

② 《周礼正义》卷五十八,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44页。马骥《绎史》斥驱兽助战“怪诞不经”,并没有充足的证据。

③ 俞樾《茶香室经说》。胡厚宣《甲骨文蒙字说》引用大量资料论述“古代勇士作战蒙猛兽之皮以为伪装”(载《甲骨探史录》36—4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请参阅。又按,也有人认为“蒙皋比”即《左传》二十八年“晋臣蒙马以虎皮”,是在动物身上而非人身上蒙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84页)。

④ 今人刘起舒《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302页)、汪宁生《释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谓《尚书·牧誓》与战争舞蹈有关,如此说可信,誓词“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黑”,就是武士戴着兽面在战前表演军舞。胡厚宣先生有相近的看法。《史记正义》认为《五帝本纪》这段话,“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又是一解。

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上古以来就有“德能致物”的信仰。《吕氏春秋·开春》“王者厚其德,积众善,而凤凰圣人皆来至矣”;《管子·小匡》“昔人至受命者,龙龟假(至),河出图,洛出书”;《国语·周语》“周之兴也,棗枳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鸞鷟(凤凰)鸣于岐山”。显然,少皞摯以鸟名官(有五鸟五鸠五雉九扈,共二十四种),是因为即位时“凤鸟适至”,有此瑞应,并不是将凤鸟作为图腾祖先来加以崇拜^①,正如不能将云、火、水、龙当作黄帝、炎帝、共工、太皞的图腾一样。此外,少皞姓“嬴”,古文字“嬴”作,从女从羸,清人方浚益认为羸乃嬴之本字,《说文》训为蜗,像“出首负壳,其纹重叠之形”^②。我们当然不能说嬴姓得名于蜗牛(“羸”当是假借字),但该字形至少证明少皞得姓并不是来自鸟图腾形象。秦为嬴姓,同样与神话传说中的感生之物“玄鸟之卵”无关。如果一定要将太皞“风”姓和凤鸟联系起来的话,我们认为这或许是动物崇拜的一种反映,而动物崇拜和图腾崇拜是两种不同的宗教形式。古代还有大量的姓氏和动植物名称无关,更无法和“图腾”沾上边,如果硬要乞灵于声韵,借助于训诂,只能是穿凿附会。

第三,中国上古三代并没有对所谓姓氏图腾加以禁忌或崇拜的习俗与观念。所谓禁忌,通常就是对本部族的图腾动植物禁止杀害或食用,如果出于特殊需要必须加以伤害的话,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请求宽恕。但在古人对待所谓与姓氏人名有关的图腾动物态度上,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禁忌。如“隹”(鸟的通称)被有些人视为商族鸟图腾的某种标记,但在卜辞中,它往往是捕猎的对象,有时一次所获就达二百五十只之多(《合集》41802)。“夔”是先公的名字,很可能是商族的始祖;卜辞中也作猿猴一类动物名称,有“其获夔”(《拾》6、9)、“雀以夔”(《乙》4718)的记载^③。看来“隹”与“夔”也都是被商人作为食品或祭物,和其他田猎物没有两样,并无特别的禁忌。商代存在凤鸟崇拜,凤鸟就是风神,卜辞言“帝使凤(风)”,视凤鸟为天帝的使者^④。卜辞中对“风”或四方风的

① 马承源先生在《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已经正确指出:“凤鸟适至”,凤鸟对少皞只起祥瑞作用,更谈不上图腾(《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367页)。

② 引自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第13册,卷12,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6696—6698页。

③ 姚孝遂先生谓:“甲骨文先公名‘夔’与兽名‘獒’在形体上是有区别的,先公名的‘夔’字其足部如人直立,而兽名的‘獒’字其足部则均屈曲。”(《甲骨刻辞狩猎考》,《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二者字形的分别当属后起,先公人名取自动物之“夔”(《说文》所谓“母猴”),没有疑义。

④ 有的古文字学家如于省吾先生认为“风”和“凤”只是假借的关系。“因为风无形可象,故借用音近相通的风字”(《甲骨文字释林》第323—324页)。郭沫若先生在《卜辞通纂》398片甲骨的考释中,对凤鸟和风神的关系已经作了可信的举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378页)。